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第二卷)

音乐学 · “音乐”之间的对话

Ritual Soundscapes

Dialogues between Musicology, Musics

曹本治 主编

◎ 宗教文化出版社

本书为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课题成果



(第二卷)

音乐学·“音乐”之间的对话

Ritual Soundscapes

Dialogues between Musicology, Musics

主编：曹本冶

编委：萧梅、刘红、齐琨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音·第2卷/曹本冶主编;萧梅,刘红,齐琨编.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80254 - 221 - 1

I. ①大… II. ①曹…②萧…③刘…④齐… III. ①音乐学:文化人类学 - 文集 IV. ①J60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325 号

大音·第二卷

曹本冶 主编

萧梅 刘红 齐琨 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06060(编辑部)

责任编辑: 宗 文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4.5 印张 37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4 - 221 - 1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学 术 文 萃

- 曹本冶 一统音乐学 / 3
- 萧 梅 体验的音声民族志 / 51
- 刘 红 1957-2008:当代道教音乐研究之定量分析 / 76
- 杨玉成 蒙古族“乃日”仪式及其音乐模式 / 99
- 杨 晓 南侗“祭萨”:音声声谱、天人观念与社群结构 / 137
- 文 君 东门岛妈祖诞辰庆典、开洋巡游仪式与音声 / 174
- 罗亮星 川东北汉族丧葬仪式中的人声研究 / 210
- 肖文礼 石城长溪村赖氏宗祠祭祖仪式音乐的考察与研究 / 242
- 孙晨荟 基督教晚祷礼拜音乐个案调查 / 262

讲 座 纪 要

- 徐 欣 邹 婧 两届“田野工作论坛”述评 / 283

研究综述

高贺杰 音乐·文化·信仰
——中国萨满音乐研究述评 / 299

译 丛

Bruno Nettl 著 音乐:不同文化中的音乐概念 / 335

杨 婧 译

Regula Burchkardt Qureshi 著 音乐之声和背景输入 / 354

徐 欣 译

Contents

Research Article

Cao Benye

United Musicology / 3

Xiao Mei

Experiential Ethnography of Ritual Soundscape / 51

Liu Hong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Daoist Ritual Music / 76

Yang Yucheng

Mongolian Nair Ritual and Its Musical Patterns / 99

Yang Xiao

Jisa Ritual of the Southern Dong people: Sound Spectrum,
Cosm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 137

Wen Jun

Mazu Birthday Celebration and Its Ritual Soundscape on Dongmen
Island / 174

Luo Liangxing

Funerary Ritual and Its Vocal Soundscape among the Han people in
Eastern Sichuan / 210

Xiao Wenli

Ancestor Worship Ritual and Ritual Music of the Lai Lineage of
Changxi Village, Shicheng / 242

Sun Chenhui

A Case Study of Christian Evening Service / 262

Lecture Summary

Xu Xin; Zou Jing

Critique of Two Fieldwork Symposiums / 283

General Discussion

Gao Hejie

Music, Culture, Belief / 299

Translation

Bruno Nettl,

trans. Yang Jing,

corrector Yang Yandi

Music / 335

Regula Burckhardt Qureshi,

trans. Xu Xin

Musical sound and Contextual Input: A Performance Model for
Musical Analysis / 354

学术文萃

一统音乐学:中国视野中的 “民族音乐学”^①

曹本冶

摘要:本文以民族音乐学为音乐学内其中一个研究领域的理念,梳理和反省民族音乐学在西方的发展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中国视野和语境中的学科认知。

关键词:音乐学;民族音乐学

作者简介:曹本冶(1946—),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音乐学院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研究员。

① 本文为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研究中心”承担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项目(项目编号e05011,2006-2009年)由作者执笔拟稿之“绪论”的摘录。该项目的课题组成员包括曹本冶、方建军、罗明辉、萧梅、杨民康、杨晓、周凯模(按拼音顺序排列)。本文是笔者(行文中以“我们”称谓表述)多年来在实践和教学中对学科的一些心得和觉悟,也为课题组成员所认同。在此感谢课题组同仁两年多来给予作者的互动以及为此文稿所提供的修改意见。

一、前言

对人类文化的研究,追其根本实质是寻求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探究。“行为”作为“思想”可以观察到的外展层面,是诸学科在研究中普遍用以切入、以此为进一步寻求对“思想”认知的途径,包括以“文化中音乐”为研究对象、属于“音乐学”(Musicology)研究领域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①

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渊源与西方对“他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殖民主义扩张有密切关系。1885年,Guido Adler为“音乐学”(Musikwissenschaft)奠定了学科的地基,其中包括对世界不同民族音乐体系的研究领域,其后由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学者发展成“比较音乐学”(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比较音乐学学者们所开拓的对世界音乐的宏观比较研究,无论在知识、理论还是在方法学的层面,都为学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为学科之后的发展提供了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学科在欧洲的发展遭受打击,部分比较音乐学学者因而移居北美。战后,学科在饱受沧桑的欧洲逐渐恢复,同时也在北美得到拓展。20世纪50年代,学科更名为“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由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学者承续了学科在北美的演进。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民族音乐学已是一个普及全球学界的学科。尽管如此,人们仍对其仍存有疑惑。归根究底,这些疑惑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1. 学科认同。民族音乐学在北美演进的过程之中出现了“音乐学”和“人类学”取向的分歧,导致了音乐体系与其文化上下文语境、群体与个人、个案与宏观性比较、共时与历时等双向关系的失调,在理论

^① Ethnomusicology自80年代引进中国学界以来,本土学者对此学科名字的中译存有多版本。本文采用“民族音乐学”这一中译,因为尽管这不是一个完全理想的译名,但至少它保持了“音乐学”的词根,能因此显示国际学界视“民族音乐学”为“音乐学”属性的广泛共识,“民族音乐学”指的是国际学界所称的“Ethnomusicology”。

方法学上过于依赖人类学,平面借用、套用、甚至滥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架构。

2. 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西方学界为满足其自身对“他者”(非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寻求而建构的学科,其全球普遍性权威,特别对那些研究自身音乐文化的本土学者们,是否是理所当然的适用?这个发源自和成长于“他者”文化中的西方学科,在面对世界多元化及本土学术传统之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取代的覆盖,并置的共存,还是取长补短的融合?在21世纪的今天,当世界各地的本土研究已有可观的成果和积累、当本土学者在数量上已成为国际学界的多数之时,他们的国际话语权是否是合时合理的?

本文将通过对学科历史的梳理和反省,就上述问题陈述我们的看法。学界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历史发展的介绍已有不少论著,比如 *Ethnomusicology* (Kunst 1950、1955、1974); *The Ethnomusicologist* (Hood 1971; 1982); *Ethnomusicology: An Introduction* (Myers, ed. 1992);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wenty - nine Issues and Concepts* (Nettl 1983); *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Music: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Nettl and Bohlman, eds. 1991);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hirty - one Issues and Concepts* (Nettl 2005); *Theory for Ethnomusicology* (Stone 2008) 等。本文聚焦于西方视野中的学科认知及其对学科的反省^①,视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为同一学科历史框架内的延续过程^②来概括学科在西方发展的脉络。

中国学界对自己传统音乐的研究早已形成学术传统。20世纪比

① 本文对学科的反省将首先以西方视野中的认知着手(以引述西方学界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原文的中文翻译采用的方式是意译,以便更好的表达原文中文字里行间的含意。凡需要为原文做补充说明的地方,在译文中用括号【】表示。

② 北美学界对学科历史的回顾,一般将学科对“音乐体系”的研究与“文化中音乐”的研究视为学科历史阶段的两分——前者(比较音乐学)为学科弃置了的过去,后者(学科在北美的的发展)为学科的新起点。我们对此不表认同;对学科发展的梗概,我们希望带出的是一个“延续过程”的概念,因为时空通道中的“过去”和“现在”连绵不断,“过去”并没有在“现在”之中全然消却,“现在”是“过去”的延伸和蜕变,没有“过去”也就没有“现在”。这与 Philip Bohlman 在“音乐与文化认同:民族音乐学历史中一贯延续的范式”一文中所采取的视野相同。(1988)

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引进,为学界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的考虑。至今,本土学者已经积累了可观的实践经验,同时,对民族音乐学这个西方学科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当我们反省西方民族音乐学及其全球话语权的必然性的同时,我们应该摆脱为西方学界做“传声筒”的被动心态,积极考虑学科“本土化”的问题,使之适合本土“国情”,为我们在研究“文化中音乐”服务,同时也在国际学界行使我们的话语权。这个“本土化”的学科,应该是一个多源、多元的“音乐学”包容。

二、音乐学、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

(一)对“他者”音乐的研究:学科在欧洲的构成

虽然欧洲对异文化的探索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时期(the Renaissance),但却是冲击整个欧洲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真正促进了欧洲对“他者”的研究兴趣,并推动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形成,包括人类学和音乐历史。(Bohlman 1991)16到19世纪西方对“他者”音乐和文化的描述和历史编纂,为其后学科的建立和体制化打下了基础。^①

随着西方向世界各国通过殖民主义和宗教传播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他者”音乐资料被带回欧洲,为欧洲学者建构世界音乐的地图提供了案头工作的重要数据,促进了欧洲对世界各民族音乐横向比较研究的系统化。

19世纪末,欧洲对“他者”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在个人兴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整合的学科概念。1885年,物理声学家、语音学家、数学家、但无辨别音高能力(tone-deaf)的 Alexander H. Ellis(1814-1890),在《论不同国家的音阶》一文中提出了测量和比较世界各种音

^① 诸如 Michel de Montaigne 对南美土著音乐(1580),J. M. Amiot 对中国音乐(1779), William Jones 对印度音乐(1784 [1964]),Guillaume Villoteau 对埃及音乐(1823, 1826),F. J. Fétis 对世界音乐史(1867)等的描述和研究。

乐体系的音程计量方法——“音分制”(cent system)。运用音分制, Ellis 对希腊、阿拉伯、叙利亚、苏格兰、印度、新加坡、缅甸、泰国、西非、南太平洋地区、爪哇、中国和日本等国家音乐体系中的七声和五声音阶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得出“世界上不同的音乐并非只用一种音阶结构”的结论,为西方对“他者”音乐的比较以及平等认知提供了人文基础(1885:485-527)同年,Guido Adler(1855-1941)在“音乐学”历史上的第一个学刊《音乐学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 Musikwissenschaft*)的创刊号中发表了《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首次系统化了“音乐学”的学科构成、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奠定了学科的地基,成为之后学科在世界各地发展的范式。

Adler 在欧洲已有的学术基础上提出了“音乐学”的主旨——就欧洲古典音乐的结构规法、谱法和情感接收(mood-substance/aesthetic content)^①进行分析、比较和归类断代,将其置于历史的时间线上规划成风格期,以求对音乐的历史过程和音乐风格形成的宏观法规获得认知。这是 Adler 为“音乐学”定下的“寻求音乐‘真善美’”的目标。^②

在学科的整体方法学上,Adler 提倡采用自然科学普遍认同的“归纳法”工序:个案研究—个案之间的比较和归类—宏观性的假设。^③

Adler 的“音乐学”,其定位和认同是一个立体化的、具“主—客”层次的认知。他的“音乐学”体系分成“历史”和“系统”两大研究领域(即“历史音乐学”和“系统音乐学”);前者为“音乐学”的基础研究,后者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以求得到对音乐“最高法规”的宏观认知。(Mugglestone 1981:15)在“历史”和“系统”之下,Adler 分别细分出若干个主要研究取向(或“音乐学”的分支学科),并以其他相关学科为“辅助”(ancillary)研究,最终形成一个具立体思维的,完整的,以“音乐学”为核心,其他学科为辅助的“跨学科”体系。

对于“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在音乐的历史化过程和

① Mugglestone 的英译。(1981:2-3)

② “the discovery of truth and advancement of the beautiful”(Mugglestone 1981:2-3)

③ 同样的步骤,在七十多年之后却被北美民族音乐学家 Allen Merriam 在他的“音乐学(艺术)、人类学”(科学)两分取向的民族音乐学框架之中用作鉴别“人类学”具有的不同于“音乐学”的“科学”特色。

音乐风格形成的宏观法规认知方面,Adler 特别注重的是风格在时空延续中的“变化”(Mugglestone 1981:8),这也是20世纪民族音乐学对“文化中音乐”的研究所关注的。

作曲家的传记是“历史音乐学”领域的“辅助研究”之一。对此,Adler 的“音乐学”构图中对作曲家的生平、传承、职业,及与其有关的文化环境,包括社团和文化机制等方面的考虑,实质上就是把对作曲家的研究置于其文化环境之中(“文化中音乐”)。(Mugglestone 1981:9-10)传记的研究并非只是停留在此阶段,Adler 进一步提出研究作曲家的目的是划分和鉴别风格时期。这是一个对“个人”和“群体”互动关系的认知——作曲家“个人”的汇集,形成作曲家“群体”的风格时期(epoch),转而回顾“个人”在“群体”风格中的角色和地位。

Adler 对音乐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也见于他对“系统音乐学”(Systematic Musicology)领域中提出的一些他认为的“重要方面”——比如,音乐与文化、气候、经济、场合、运用、价值观等方面的关系(Mugglestone 1981:11-12),这些也都是后起的民族音乐学所特别关注的。

“系统音乐学”领域中的第四个取向或分支学科,Adler 称之为“Musikologie”。这个音乐学支系是 Adler 对当时欧洲学界已经展开的对世界音乐比较研究的肯定:“【这是】音乐学的一个新的、且很有价值的分支……比较音乐学。它的任务是对以民俗学【或民族志】的描述记录为手段,比较【非西方音乐的】音响产品,特别是就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民歌,按照其风格特征进行汇集和归纳。”(Mugglestone 1981:13)

对研究与实践,Adler 认为“研究不能脱离艺术,只有在保持研究与艺术【实践】的有机互动之中,研究才能真正达到其学科的宏观目的。实践和研究不是两个分开的部门,它们属于同一领域。”(Mugglestone 1981:17)遗憾的是,后起的学者们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不少人把音乐研究中的“理性”与“感性”划分开来,将所谓的理性研究凌驾于实践之上。

(二) 欧洲对“他者”音乐的研究:世界音乐体系的宏观比较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对“他者”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心理学和哲学家 Carl Stumpf 和他 24 岁的助手 Erich M. von Hornbostel 在柏林大学的“心理研究中心”建立了一个研究世界音乐的音响档案库,之后发展为著名的“柏林音响档案馆”(Berlin Phonogramm - Archiv),并以此为基地,凝聚了一批多学科背景的德奥学者群体(“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 Berlin School of Comparative Musicology”),开拓了对世界各地音响的收集、整理和存档,对音乐的起源、传播和发展,及世界不同音乐体系的比较,乐器历史与分类、音乐接受心理和音响学等被认为具有普遍和共性的问题做比较与整合,以求建构时、空脉络上对世界音乐之“人的普遍性”的宏观叙事话语。活跃于该时期的比较音乐学家,除了 Stumpf 和 Hornbostel,还有 Otto Abraham、Fritz Bose、Marious Schneide、Robert Lachmann、Curt Sachs、Mieczyslaw Kolinski、George Herzog、Bela Bartok、Zolta Kodaly、Constantin Brailoiu、Vinko Zganec、Franjo Ksaves 等欧洲学者。^①

比较音乐学对世界不同音乐体系的比较研究是与当时人文社科学界的思潮和关注并行展开的。Hornbostel 和 Sachs 等人对世界音乐的比较研究,明显的体现出当时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思潮,以及 1900 年前后人类学建构文化历史的一些理论(如“文化圈”)的渗透。比较音乐学延续了 Adler 的立体跨学科概念,在“音乐学”的定位中接纳了数学、物理学、植物学、生理学、心理学、音响学、美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作为辅助学科。音乐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资料,其形态部分被视为是能够量化的“科学”研究依据(显然是自然科学方法学的借鉴),而世界音乐之间的形态风格异同,在宏观历史时空的框架内,被予以当时覆盖所有学科思维的“进化论”解释。尽管 20 世纪中期学界质疑“进化论”在世界音乐研究中的运用,但这一思维在当时的文化思潮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Bohlman 1988: 34)按照当代北美民族

^① Ellis, 由于他对世界各种音乐体系的比较研究以及“音分制计算法”,也被学界认为是比较音乐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音乐学家 Ruth Stone 对当今学科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学概观,“进化论”和“文化圈”的概念,以及比较音乐学对它们在音乐研究中运用的经验和成果,至今仍对 21 世纪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思维有着影响,并以不同形式运用于学界的研究中。(2008: 24-36)

1933 年,德国纳粹党执政,欧洲政治局势处于动荡之中。同年, Hornbostel 由于母亲是犹太人,被纳粹政府革职。他随后移居瑞士、美国,最后在英国剑桥落脚,1935 年逝世于斯。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少柏林学派学者被迫离开欧洲,流亡国外。北美,特别是美国,成为他们战乱时期的政治避风港,不少人移居美国,在大学任职。他们通过在北美的教学和研究使比较音乐学的脉络在北美得以延续和扩散。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二战”后(特别是 20 世纪中叶以后)学科情况的英文文献资料,主要来自北美学界的书写,内容范围大多将重点放在学科在北美的的发展,对战后欧洲的发展情况甚少提及。但事实是,欧洲的比较音乐学学术传统以及欧洲对“他者”(以及自身)音乐的研究并没有因为战乱而中断;大战后政局稳定之时,欧洲很快便在战前已有的学术基础上延续和发展其固有的传统,对此我们将另辟小节讨论。

(三)对世界音乐文化的研究:学科在北美的的发展

1950 年,Jaap Kunst 提出了为“比较音乐学”更名的建议。他认为比较音乐学所用的比较方法并不是学科所特有的,故用“比较”定名该学科不能显示其独特性。而且,由于学科当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西方其他民族的音乐及与音乐有关联的社会文化因素,他建议以“Ethno-”取代“Comparative”。“Ethno-”的词意可以有“民俗学的”、“民族志的”、“【各】民族的”等指向;Kunst 本人没有对此做进一步澄清。但从他所界定的学科领域来看,这些含意似乎都包括在他的用词之内。(Kunst 1974: 1) Kunst 的新学名保留了学科的“-音乐学”(musicology)词根,表示了他对学科为“音乐学”属性的立场。他对学科脉络的梳理见于《民族音乐学:属性、问题、方法、代表人物》(*Ethno-musicology: A Study of Its Nature, Its Problems, Methods and Representative Personalities*)。在以“音乐”作为学科研究的直接切入点这一基本取向的定位上,该书引述了大量比较音乐学时期的研究成果。显然,他提出